

如何维系不确定世界中的低信任中美关系

近期，美方在香港、台湾、新疆、南海、科技、疫情等方面多头向我施压。7 月 24 日单方面关闭我驻休斯顿总领馆。蓬佩奥 7 月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全盘否定中美建交的成果，鼓吹对华遏制。未来的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较长的低信任的交往时代。

一、蓬佩奥 7 月涉华演讲表明美国精英对华认知的逆转

美方的系列行动可以从微、中、宏三个层面来分析，即政治家的短期诉求、外交风格的周期震荡和美国国民集体意识。

(一)从短期看，关闭休斯顿领馆的外交挑衅行为是为了挑动反华情绪，谋求政治家个人的选举利益。对特朗普来说，所有政策要围绕三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在疫情冲击下，美国二季度 32.9% 的经济萎缩导致了 14% 失业率，特朗普在五个关键摇摆州中民调全面落后，拥有 38 张选举人票的共和党铁盘德克萨斯州开始摇摆。2018 中期选举德州三大城市都转投民主党。今年疫情带来的低油价使得德州的页岩气中小企业亏损惨烈。

特朗普为刺激保守派出来投票，制造一次对外事件。与发动经济战军事战等选项相比，关闭中国领事馆，驱逐中国记者等行为是最安全又能表达强硬的手段。其政策后果可控的，无非就是按照外交惯例对等反制，关闭一个美国领事馆。而且这具有媒体效应，自媒体上破后门而入的画面很适合南方“红脖”选民的口味。

（二）从 4 年期看，特朗普政策是美国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外交传统的回归。美国历任总统外交风格会在美国优先与多边合作之间做周期性摆动。以冷战后对华政策为例，克林顿时期维持对中国“主动接触”，倡导全球合作；小布什在反恐上是单边主义，中美则互为“利益攸关者”；奥巴马后期中美退为“非敌非友”；特朗普的政策则是向里根主义的回归，重申美国利益优先，重提意识形态斗争，意图遏制主要对手。

特朗普外交表面呈非理性，实则具有清晰的博弈论逻辑线条。特朗普奉行“交易的艺术”，在博弈论中称为“发疯策略”，让对方相信自己是非理性的，让对手害怕，做出主动让步。主要方式包括：极限施压，全方位恐吓对手；通过“退群”放弃多边机制合作，推翻原来的合作规则与惯例；抛弃共赢互利，通过打压对手获得收益。

（三）从 10 年期看，反华共识明面化表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集体认知的逆转。蓬佩奥 7 月涉华演讲把“反华”从“心照不宣”到“说破”提升到了重大政治宣言的高度。这说明，第一，美国精英对中国已从“傲慢”到“厌恶”，到现在的“忌惮”。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模式可能会赢。例如纳瓦罗与班农等煽动必须尽快

行动。这种“再不开战就晚了”的焦虑类似于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最后一战”的心态。第二，反应了美国战略界的主流思维还是冷战话语。美国公开讲述“新冷战”是对国外政府与国内民众发出了一个信号，美国的战略重心要改变，中美要进入一种战略竞争状态。

二、中美博弈战略相持阶段的几种可能性

中美博弈中的速败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切实际的，要用底线思维去分析中美相持的几种可能性。

（一）最坏可能就是形成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类似“美苏冷战”状态，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要逆转亿万人汇成的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制造一场世界分裂，不是某国的一届政府想做就能做到的。它至少需要几个条件，包括重大全球事件的发生、大政治家的动员和各国的参与。美方的少数极端政客显然并没有那样的国际与国内动员能力。中国不会出现战略性错误，因为中国文化没有宗教狂热式的扩张诉求。美国要进行文明划线，把西方白人文明和亚伯拉罕系宗教划成一派，把中国单独划成异类文明，组织一个世界反华的“神圣同盟”，很难得到广泛国际支持。

（二）美国能制裁中国的最严厉方式就是“伊朗模式”，即同时组建全面的政治同盟与经济制裁联盟。美国认为有能力全面制裁中国时，就会采取“全面封锁”策略，但这种制裁伊朗与朝鲜的方式很难对中国奏效，因为美国不但要俄罗斯、伊朗等敌对国家战略和解，还要向其他第三国提供补偿的对价。由于当今国际结构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而是一超多强、多元互动，各国都拥有充分

的经济自主权。从博弈论讲，此时第三方国家的最佳策略不是加入美国的政治同盟去制裁中国，而是进行“两面下注”，在政治上与美国合作，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两边同时获得收益。

即便美国能暂时组建反华政治同盟，施行大规模禁运的“大陆封锁政策”，也很难真正长期有效执行，因为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聚合起来的政治联盟，终究要让位于建立在物质利益互惠的经济联盟。1806年拿破仑法国联合整个欧洲大陆封锁了英国8年，冷战时期苏联整合东欧的华约对抗美国的北约近40年，最终都是政治军事占优的大国（法国和苏联）输给了奉行自由贸易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强大的国家（1820年代的英国和1980年代的美国）。未来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心和商业贸易的枢纽将是中国。

（三）比较现实的可能就是“奥巴马-拜登方案”。先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西方经济同盟和产业链条，形成“一个世界，两种制度”，然后以此基础逐步扩展成政治联盟，进而遏制中国。美国认为实力不足以全面压制中国时会采取这个“积极防御”策略。如果拜登上台，就会重拾当年政策，在政治上重新凝聚欧洲共识、推行印太战略。在亚欧分别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另起一套贸易规则，建立一套新的产业链，挤压中国的经济与贸易空间。

但这个另造一套经济体系的方案最终很难成功，原因是中国的超级工业生产能力和一种社会体制与科学技术的集成创新，任何一国都无法取代。当今世界与30年前大不相同。上世纪9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都拥有工业2.0或3.0水平的产业体系，各国人民都是

二战前后成长起来，没有过分的物质消费需求。所谓“经济互相依赖”只限于国际贸易与部分行业投资。经过了30年的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的水平和规模已经指数级增长，西方各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和生活品质都有更高要求，西方国家要恢复产业链，绝非一朝一夕。从人口周期看，曾经造就美国产业辉煌的1940-1950年出生人口已经退休，1970-1990年出生的工业人口现在已经断档。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如果一个人20岁之前不进工厂，那么他终生不会再进工厂从事劳动工作了。美国要想大规模地再工业化，只能从2010年后出生的这代人中培养。

（四）中美博弈的最乐观估计就是类似于10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政治、文化、科技交流都趋于冰冷，但是经济上互有默契。双方都不逼迫盟友站队，各国都可以纵横捭阖地自由组合。当美国决策界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会采取“消极制裁”策略。这个情景之所以可能，因为它不追求激烈改变现状，符合能量最省原则。目前美国陷于严重的财政、族群、就业等国内危机，各方势力执行对华制裁政策时候，都希望对自己的政治压力最小，在较量平衡之后，只能选择阻力最小的方案。

美国要想长期维持对华高压，前提是形成稳定又强大的支持这一行为的行政班底、精英集团和社会基础，然而这些都不具备。第一，美国“政治分肥”的官员选拔机制很难保持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与纪律性。第二，美国社会高度交叉分裂，很难产生一个在产业界、政界、军界同时得势的反华小集团。第三，美国社会内部有着与中国保持积极经贸合作的迫切动力，以防止美国内物价飞涨，稳定美

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三、取得战略相持胜利的三个条件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取得相持阶段的胜利有三个条件，也可以运用到今天。

（一）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1. 保持不为所动的战略定力。在实践界与理论界中不应该提“新冷战”。美国意欲逼迫中国走上阵营对立的僵局，我们不能对号入座，那就会掉入对方的话语陷阱，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2. 做好内循环。利用机遇深化改革开放，激活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锻造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完备的工业产业链、供应链。

（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

1. 把握当前民生是国际道义的正义话语。高举自由贸易、全球化、共同发展的大旗，联合世界各国人民。

2. 合理让利。单方优势只是一时之快，互惠互利才是正道。利用合资合营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在投资国建立利益共享的社会基础。

3. 对国际竞争保持一种开放心态与辩证思维。成功需要朋友，也需要一个伟大的对手。

（三）相持中静观待变，世界人民的民意潮流会在十年之内发生大逆转

1. 美国的族裔政治来得比预想更快。少数族裔政治人物更加关注国内议题。四年后，更多的60年代出生的少数族裔将进入美国高层。届时班农等“后婴儿潮”保守一代在政治上将可能失去话语

权。

2.十年后的世界民意主流将更趋向支持全球合作。到那时全球更多国家步入城市化阶段，对全球产业体系的依赖性更强。Z世代（1995-2010出生）的价值倾向比上一代更包容全球化，2020疫情后的新一代孩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更深刻开放的视角。

总之，稳定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要掌握“变”与“常”的辩证法。“变”的是美方一部分人的意识形态明面化导致对华敌意的公开化。“常”是全球化与经贸合作还在继续发展，多级化格局没有改变。我们必须正视美国少部分人对失去世界第一的“集体生存焦虑”，防止美苏式冷战重演，推动中美在一种全球化的合作与碰撞中实现新的和平发展。

（战略研究部 毕成良）